

新见《阙里志》及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孔祥林

孔尚任一生著作颇富，但佚失很多，《阙里志》就是其中的一部。近日偶然发现于孔府库房中，书虽然已经残缺，但对孔尚任的研究还是有着很大价值的。

一、孔尚任《阙里志》的概况

孔尚任《阙里志》的行款：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0.7厘米，宽14厘米，每页9行，行21字，竹纸，下口有“金丝堂”三字。每卷首页有“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孔毓圻鉴定，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毓埏参订，曲阜县世职知县孔兴认监修，林庙举事孔贞枚督刊，太学生孔尚任编次”等字样。可知是衍圣公府的自刻本。

此书现存卷二至卷九，卷十一至卷二十三，共二十一卷、十册，据著录应为二十四卷，现尚少三卷。卷首和卷末皆缺，其序、跋和目录如何？不得而知了。现有内容：圣贤志、陵墓志、祠庙志、古迹志、名胜志、祀典志、封爵志、宗族志、学校志、礼仪志、乐舞志、土田志、户役志、人材志、著述志、风俗志、物产志、典谟志、艺文志、史传志等，在卷十一《宗族志·世业》中还提到“详见《恩例志·免役》”，可知还有恩例志。

二、孔尚任的《阙里志》和《阙里新志》是一书还是两书

孔尚任《出山异数纪》说“明年春，即延任祖庭修《家谱》及《阙里志》。”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说：“康熙丁丑，族祖聘之（孔尚任）尝别撰新志，一变旧志体例。”后来容肇祖和袁世硕二位先生写《孔尚任年谱》时，便认为孔尚任曾修了两部《阙里志》，一为康熙甲子（1684）本，一为康熙丁丑（1697）本，前者系“更订”，后者为“别纂”。对不对呢？

《阙里志》原系明陈镐撰写，刊于弘治十七年（1504），此本久已不传。至明末孔子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胤植在陈本的基础上作了重纂，入清又作了增补，仍为二十四卷，这就是现存最早的《阙里志》。孔继汾称孔尚任纂修的《阙里志》为“新志”，是指“一变旧志体例”而言，也可能是借“新”以区别二书。《阙里文献考·叙考》，逐条列举了新、旧志的讹误，据其引文核对，证明旧志即入清后的增补本，新志就是今见的孔尚任《阙里志》。

针对成书年代，我查阅了孔尚任《阙里志》的内容，如在卷十五《土田志》所收历任管勾姓名及任职时间，最后一位是开泰。据孔府档案记载，他是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为父丁忧”去职的，接任管勾的为王自庄，是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议”就任，可是在“题名”项中却未收录；同样，在卷十四《乐舞志》中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衍圣公咨请吏部题授司乐王国光亦未收入。这与孔尚任《出山异数纪》所说：“甲子秋皆竣”一语完全相吻合。可是，在本书的其他各卷中却发现有关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事迹的记载，如卷二十三《史传·小传》中，收有《敕褒节孝朱氏传》和《敕褒节孝陆氏传》二文，均为孔尚任撰。据《（乾隆）曲阜县志·通编》说：“康熙四十五年……表节妇……孔毓圻妻陆氏，孔

尚恪妻朱氏”。可知孔尚任之两文，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写的。再有，在卷七《遣告》中，最后收录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徐秉义祭告事，康熙四十八年的梅士珩遣告就未收入。看来孔尚任的这部《阙里志》，以后有人作了增补，但不完备，其时间当在康熙四十五至四十八年（1706—1709）之间。这时孔尚任已罢官家居，是否由他增补，有待考证。

关于孔继汾说的“康熙丁丑”问题，是指孔尚任《阙里志》刊行的时间，从书成到问世相隔十三年。其原因：当康熙二十三年秋书成后，即知康熙南巡回京时要亲来曲阜祭孔。孔尚任立即“率诸弟子在庙肄习”，准备迎接康熙皇帝，当然无暇顾及《阙里志》的刊刻。康熙祭孔后，孔尚任被赐为国子监博士，又忙于赴京做官。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衍圣公孔毓圻即请旨纂修《幸鲁盛典》，直到二十八年五月《幸鲁盛典》才初步告成。在此期间不可能来刻《阙里志》。孔尚任在扬州治淮时给《幸鲁盛典》副总裁孔毓珽的信中，只是谈到如何纂修好《盛典》事，未提《阙里志》，很可能此书早已决定暂不付梓，用不着提及。不知容、袁二先生二次修志的说法由何而来。

三、从孔尚任《阙里志》的记载也可考证名人的事迹

1. 关于孔尚任的事迹。袁世硕《孔尚任年谱》说：“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九月，迁户部主事”。今见《阙里志》卷二十三《史传·碑志》收有孔尚任撰孔尚钺墓志铭说：孔尚钺“乙亥春始转户曹”。又说：他与孔尚钺“同升户曹”。可知孔尚任也是乙亥春升任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据孔尚任给孔贞选撰书墓碑的署款）的。这就比袁世硕所说的九月升任户部主事早了半年多。

2. 关于孔方训的事迹。袁世硕《孔尚任年谱·交游考》说：“方训，自然是他（孔尚则）的号。”这是袁先生根据资料推断的。今见孔尚任《阙里志》卷十七《人材志·科第》孔尚则小传说：“孔尚则，字方训，天启丁卯科举人，崇禎庚辰进士，授维阳全椒知县，擢刑部山东司主事，广西司员外、江西司郎、封奉直大夫。”可知“方训”是字非号。袁先生在《孔尚任交游考》中又说：孔尚则“大约在南京沦陷后归家”。今见《阙里志》卷二十三，有孔尚则给孔闻诗撰写的碑文，文中有“顺治丙戌，余自白下罢闲还”句，可知孔尚则是在顺治三年（1646）即南京沦陷的第二年自南京（即白下）罢归还曲阜的。

3. 关于孔贞璠的事迹。孔贞璠是孔尚任的父亲。袁世硕《孔尚任年谱》说：贞璠“号琢如”。今见《阙里志》卷十七《人材志·科第》说：“孔贞璠，字琢如，崇禎癸丑科举人。”可知“琢如”是孔贞璠的字，非其号。

在孔尚任《阙里志》卷二十三《史传·碑志》中，收有孔贞璠的墓志，撰文者为王清。他是山东海丰人，顺治六年己丑科进士，贞璠的好友。这篇墓志仅残存一百二十字。过去大家都是从《阙里文献考》和《曲阜县志》中知道孔贞璠是位养亲不仕，崇尚民族气节的士人。因而认为孔尚任自幼受他的影响，具有民族思想。但与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监事的矛盾难解决。今从孔贞璠的墓志中，知道他曾想出仕，所以参加了顺治六年（1649）的会试，因为未中，只好“故服旋里”，才“以耕钓自高”的。这样，对孔尚任的追求功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孔尚任的《阙里志》虽系残本，其内容比旧志“颇有增益”，不仅资料丰富，文字亦简洁明了。此书早在乾隆年间，孔继汾就说：“其书久而不行”，各大藏书家的书目亦未见著录，为了给三孔研究者提供资料，我们将它已列入古籍整理计划。